

哲人追“思”^⑧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者

——夏甄陶哲学思想研究

□ 朱华彬 郭 湛

1 初入哲学门:曲折艰辛的求学路

1931年4月1日,夏甄陶出生于湖南省安化县二都乡(今羊角塘镇)一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小山村——符竹村。他在一首词中写道:“我本湘中山水郎”“少年不知乾坤大,老大方知学问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安化县躲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很多学校的避风港。一些沦陷区的学校包括湖南省立第五中学都迁到这里,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长沙和武汉的大学老师也都来到这里任教,大大提高了这里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夏甄陶非常幸运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为自身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学时代,他被一些看似玄奥的问题所吸引,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50年1月,夏甄陶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做了半年小学教师。同年7月,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家乡,到长沙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因为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再加上囊中羞涩,住在他的高考旅程非常艰难,没钱住旅店,晚上就睡在湖南大学的教室里;没钱吃饭,就仅在每天早晨晚上吃一碗米粉;没钱买返回的船票,就到湖南省教育厅开证明,以免免费乘船回家;走水路,还要步行180里山路才能到家……由于对哲学情有独钟,他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著名高校的哲学系。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他被这两所高校同时录

2 阐释与探索:推动实践结构理论研究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而开启了全国思想解放的序幕。几乎与此同时,夏甄陶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5期发表了《真理是具体的——读书笔记》。文中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哲学命题。这一讨论在哲学界引起深入展开,引发学术界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进行重新理解。其中,关于实践内涵的研究和讨论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思想解放,使之开始摆脱“左”倾思想束缚,逐渐走上理论发展正轨。紧接着,以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为标志,学术界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和创新发展的高潮,夏甄陶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一是重新审视实践涵义,提出实践一般结构理论。1979年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哲学界引发学者对实践涵义、要素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夏甄陶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发表了《实践的要素、特性与真理的标准》一文,提出“目的是实践的一个要素”的观点,率先对实践涵义和要素进行重新审视,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哲学研究》在同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深入开展实践标准的理论研究》指出,实践理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需要继续深入实践研究。

二是揭示实践范畴的丰富内涵。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对实践观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从重要范畴、实践诸因素的作用、实践如何检验真理、实践检验与逻辑检验的关系等问题。由此,关于实践理论的研究在哲学界迅速展开。此后,夏甄陶又先后撰写并发表《什么是实践》《再谈实践的涵义和要素》《论目的》等文章,更加详细地阐述实践涵义和一般结构理论。《哲学研究》杂志社王玉恒曾表示:“夏甄陶关于实践一般结构的理论,不仅在实践理论的研究本身是一大突破,而且对理论界的学术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不只在当时,就是后来理论界对实践功能、实践分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等众多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可以说是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认识论研究热潮,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夏甄陶(1931.4—2014.12)作为这一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不仅在认识论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而且在实践唯物主义、人学以及中国哲学多个领域都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

西“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3月,他被调到国家计委地质总局政治部工作。由于眷恋哲学研究事业,1975年9月,他申请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工作。1976年“四人帮”倒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走上正轨,他从此开始了自己热爱的哲学研究事业。

从实践结构问题的研讨而引发出来的。”夏甄陶认为,实践是主体和客体两种物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目的、手段、结果是实践的基本要素。他在学界第一次明确提出“目的是实践的一个要素”的观点,并深入分析了目的在实践过程中的作用和发生机制,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当时,一些学者受改革开放前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条思想路线斗争观念的束缚,错误地认为,把目的作为实践的一个要素会导致实践观上的“二元论”,并将最终导致唯心主义。他们主张把目的因素从实践概念中排除,对实践观进行唯物主义的“净化”,使其成为纯粹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然而,“左”倾思想束缚,逐渐走上理论发展正轨。紧接着,以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为标志,学术界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和创新发展的高潮,夏甄陶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三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改革。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断发展,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改革成为学术界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命运等展开热烈讨论。教科书的改革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紧密相连,也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教科书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教科书体系是否需要改革、怎么改革等一些重大问题,是教科书改革的焦点和突破口。学者们根据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的不同理解,提出不同的教科书改革方案。

夏甄陶在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参照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主张“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石,以现代社会实践为现实基础,以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人对世界的自觉能动掌握和对属人世界的自觉能动创造为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将本体论(包括历史观)和认识论(包括实践论和方法论)内在统一起来,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统一中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虽然当时的教科书改革并未最终完成,但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开创和奠基:构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论体系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夏甄陶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中国哲学上,他主要研究了西周的社会性质、春秋战国时代的奴隶制以及周公的天命思想等。他还对荀子的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于197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论荀子的哲学思想》。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夏甄陶本想继续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但单位领导根据工作需要,将其安排到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室,后又由研究室领导分在认识论研究组。1978年哲学研究所招收首批研究生,他就负责指导认识论方向研究生。从此夏甄陶就把研究方向定在认识论领域,开始了认识论研究的学术生涯。1985年夏甄陶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任教,继续从事认识论研究。

夏甄陶是最早投入认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深耕几十载,在当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人中,取得的学术成果最为丰硕。虽然不少学者在某个或某些认识论问题上提出了颇具见地的观点,但在成果的数量、质量上,还是在成果的系统性、开创性和影响力上,夏甄陶取得的成就都是最大的。夏甄陶史论结合,既有对认识论原理的开创性研究,又有对认识论思想史的系统梳理;不仅涵盖了新时期我国认识论研究讨论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是开创性、引领性的。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指出:“从认识论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夏甄陶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代表了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学术水平。”可以说,夏甄陶为新时期我国认识论的兴起和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

一是对认识论原理作开创性探索,建构系统的认识论思想体系。从研究目的范畴和实践理论开始,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石,夏甄陶对认识论的本质、认识的系统结构、认识的主一客体相关律、认识的发生、认识的过程、思维活动、真理与价值等认识论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

1986年,夏甄陶在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认识论引论》一书,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认识论学术专著兼教科书。1991年,此著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王玉恒指出:“据我们所知,它是‘文革’后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全面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4 反思与回应: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

20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夏甄陶投入了人学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他与北京大学黄树森、陈志尚合作主编了《人学词典》,参与写作了由陈志尚主持的《人学原理》,为学术界开展人学研究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此外,他还撰写了《人是什么》《人:关系 活动 发展》等学术专著。夏甄陶长期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是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夏甄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以现实的人为根本出发点,考察分析客观世界和人类历史,是以人的解放为理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包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在《人是什么》一书中,他从人作为自在存在物、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对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对人的生活、对世界的探究和分析。他强调,人是多种规定的统一,对人的本质的考察,最根本的是要透过人的活动即实践的感性活动,综合考察人怎样创造自己的各种存在状态和规定性,以及怎样实现自己的进化发展。在《人:关系 活动 发展》一书中,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基本理论观点,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究天人之际”的

思想与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从关系、活动、发展辩证统一的角度对人作了较为系统化的整体性理解,尤其剖析了人的新型存在方式、人的价值和理想、人的普遍性,以及人的局限性和超越方式、以人为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发展等问题,提出很多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和理论价值的观点。

夏甄陶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更是从人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更加透彻系统的阐释,阐明了关于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观念:人是实践的存在物。“人,作为感性的、社会的、活动的人,通过物质的感性实践活动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不断生产自己的多种多样的人的生活,不断创造自己的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并使人获得与这多种多样的人的生活、对世界的探究和适应的现实性和规定性;人也因此而成为具有现实的特性和本质的现实的人。一般地说,人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生活的。而人怎样表现自己的存在和生活,他也就是怎样的人。人存在于生活于通过人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的世界中”。

人学研究是夏甄陶整个哲学研究的一个前提,也使夏甄陶整个哲学研究更加完整。夏甄陶认为,与其他学科一样,哲学思考是以有生命的人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哲学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他将人学作为其哲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一以贯之的方法:“人与世界的大关系不仅是哲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总课题,而且也是哲学思考和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的总的参照系。”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前提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关系出发是与从实体出发相对的,他反对以实体为出发点的哲学,他认为,这种实体化思维方式和本体论思维方式最终导致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神秘的创世说。

夏甄陶著作等身,成就卓越。李准春、郭湛合作主编出版了《思维世界导论——关于思维的认识论考察》,从认识论的角度把思维纳入认识过程加以考察,深入分析了思维的发生、思维的结构和功能、思维的本质、思维的活动和方法、思维世界和人工智能、思维世界的发展等问题。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特征;从创造性的发生、思维的结构和功能、思维的本质、思维的活动和方法、思维世界和人工智能、思维世界的发展等问题。2004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夏甄陶还较早提出并研究了人的认识的真善美相统一的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仅仅从求真、求美的角度来理解认识,但人是按照主体性原则认识世界,认识既要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本质的掌握,又要体现人的价值需要,还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因此,应当从真善美相统一的视角来认识认识的本质,揭示认识过程中真善美统一的具体形式和内部机制,研究认识内容中真善美与主体认识定势中知意情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从人掌握世界的活动方式、目标和趋向,论证了人的观念的和实践的掌握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追求和创造真善美的对象的功能和特征;从发生学的视角考察了真善美统一原则的生物学前提;还考察了真善美的原始表现。

二是对认识论史作系统性梳理,为认识论研究提供厚实的理论资源。在进行认识论原理研究的同时,夏甄陶还非常重视对中外认识论思想史的梳理。他与崔建军、纪虎民合译了英国著名哲学家D.W.海姆伦撰写的《西方认识论简史》,较早地介绍了西方认识论研究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默默耕耘十余载,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线索发掘中国传统哲学,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思想为参照,对中国历史上50多位思想家的认识论思想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完成了《中国认识论思想史》(上、下卷),此著1998年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夏甄陶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关系、主客关系、形神关系、名实关系、言意关系、学思关系、知行关系等,虽然不都是直接论述认识论问题,但已经包含对现代认识论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的征兆、胚胎和萌芽,已经涉及认识的本质、条件和来源,认识的过程、方法和目的,认识的内容和形式,认识的检验和评价等认识论问题。夏甄陶将其挖掘出来,不仅利于我们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认识论思想,还为我们建

构新的认识论原理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当时,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认识论思想,夏甄陶以这部大部头论著予以澄清,填补了中国认识论史研究的一大空白。夏甄陶花费10多年独自完成这部皇皇巨著,不仅体现了他执着的治学态度和顽强的毅力,而且还体现出其深厚的中国哲学功底。著名哲学家石峻评价说:“当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者不在少数,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兼攻中国哲学史而又深有造诣者,可能并不太多,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夏甄陶教授恰是这极少数专家之一。”

三是对我国新时期认识论研究的突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建构专门的认识论理论,他们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改革开放前,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我国传统的认识论研究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实践范畴的内涵和重视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而从物质、客观性出发解释人的认识,将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外在环节来理解,没有将实践作为理解人的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未能建构科学的认识论理论体系。夏甄陶将科学的实践观纳入认识论,深入剖析认识的本质及相关原理,不仅恢复了马克思创立的关于认识论的概括性原则,而且立足当代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阐释和再创造,建构了系统的认识论思想体系,填补了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中的很多理论空白,为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整个80年代,认识论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甚至整个哲学界聚焦的研究对象,是当时我国哲学研究无可争议的研究热点。中国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和繁荣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根源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曾遭遇挫折,迫使我们从认识上查找原因,继而解放自己的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而这一重大的思想变革和历史转变必然需要科学的认识论理论进行指导。可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认识论研究热潮,为九十年代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看,作为这一研究热潮的代表性人物,夏甄陶认识论研究成果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也具有时代特征。

他一生专注于其热爱的哲学事业,更是用哲学诠释和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实现了哲学人生与人生哲学的完美统一。正如他在词中所言:“内外乾坤,相应相因,会通时,泉脉深深。滋生智慧,造化文明,但又求美,又求真。”他胸怀祖国,始终将哲学的思维关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他志存高远,在哲学道路上孜孜以求,铸就了坚定的学术信念和远大的学术抱负;他为人低调谦逊、淡泊名利,在朴素和简单中默默攀登哲学的高峰;他喜欢恬静雅趣、怡然自得的生活,在物我交融中探寻哲学的美妙;他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为我国哲学事业发展培养出不计其数的人才。夏甄陶的哲学思想以及为学、为人、为师的境界和精神,将永为后世敬仰。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编审、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荣誉一级教授)



理论部主办